

Opinion

Observer
上证观察家

大变局大危机需要新思路、新战略。要彻底破解中美经贸关系迷局,双方需要彻底的、多层次的、互利的解决方案。或许,美国经济学家Prasad提出“大谈判”(Grand Bargain)的思路值得我们借鉴:中美之间应该就最核心、最深层次的问题集体谈判,用一揽子相互承诺来确保双方在损失最小的情况下尽快走出危机。这可能涉及一系列利益交换。

破解中美经贸迷局需要新思路新战略

美国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首次出访选择东亚,而非传统盟友欧洲或者战略要地中东,这说明东亚地区已经成为新任美国政府外交战略的重心,而中国可能成为重中之重。

在经贸领域,希拉里要与中国政府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清晰的,中国如何应对次贷危机冲击,并如何参与全球救援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中美贸易、人民币汇率与贸易保护主义;中美之间的资本流动,尤其是中国是否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等。不过,由于这三个问题盘根错节,彼此关联,而且涉及中美政治博弈以及讨价还价,希拉里显然无法就这三个问题与中国政府达成原则性共识,现实的结果是双方明确提出这些问题,并建立一个持续讨论的制度性框架——这框定应该是中美经济战略的对话机制。在各自经济增长率下滑的前提下,中美之间就经贸问题的讨价还价必然是一个长期而痛苦的过程。

事实上,在如何应对次贷危机问题上,美国和中国是全球范围内针对次贷危机冲击采取的措施最快以及措施力度最大的两个国家。在货币政策方面,美国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0-0.25%的水平上,并通过数量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资金,可以说货币政策已经宽松到无以复加之地步;而中国央行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也大幅降低人民币存款利率以及人民币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且取消了针对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度控制。从2008年11月起,国内贷款额度连续飙升,2009年1月更是达到16万亿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在财政政策方面,布什政府推出了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纾困计划,奥巴马政府通过了789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国政府也于2008年11月出台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方案。相比之下,欧洲、英国等其他重要国家出台应对方案的时机与力度都稍逊一筹。

在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救援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问题上,中美之间分歧并没有世人想象的那么大。一方面,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国家,美国并不愿意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有根本性改革,因为这可能危及领导地位。而以中国目前的状况,尚不具备法、德、英等发达国家那样向美国叫板的实力。中国只是会提出修订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而非如欧洲国家那样提出一个全新的、系统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另一方面,对IMF是否增资上,中国要求将增资问题与IMF的份额重新分配结合起来,中国向IMF提供资金的份额是在IMF中份额显著上升,以反映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而在这一点上,中美之间没有原则性冲突。美国在IMF中的份额与美国经济的相对地位是相称的,目前份额过高的是欧洲国家,重新分配份额的结果很可能是中国获得欧洲国家出让的部分份额。

中美贸易问题将是长期困扰两国政府的一大难题。民主党传统上是美国制造业蓝领工人的代言人,出于政治考虑,他们不得不为本国制造业利益奔走呼吁,这也是“购买美国货”条款出台的一大背景。美国财长盖特纳上任伊始就指责中国政府操纵汇率,反映出奥巴马政府将在汇率与中美经贸关系上大做文章。而次贷危机已经给中国经济造成显著冲击,出口行业不景气所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已经加大了国内就业压力,为防止失业加剧对社会稳定的冲击,中国政府当然会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一旦中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搭起架子,结果可能两败俱伤。

中国是否为美国融资的问题也在困扰。一方面,美国需要以中国为问题的外国央行的支持,因为增发美国国债是唯一对美国经济冲击最小的融资方案。如果外国央行拒绝购买美国国债,则美联储被迫成为国债的唯一买方,而这意味着货币超发、恶性通胀与美元贬值;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发现,购买美国国债的风险越来越大。美国政府大量增发国债将造成中国持有的存量美国国债的市场价值大幅缩水,而美国政府印刷钞票、制造通胀来转移债务负担的做法将导致美元贬值,从而使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面临灭顶之灾。在这个涉及美国能否迅速走出危机,以及中国政府能否保证国民财富安全的问题上,双方短期内很难达成实质性协议。

大变局大危机需要新思路、新战略。要彻底破解中美经贸关系迷局,双方需要彻底的、多层次的、互利的解决方案。或许,美国经济学家Prasad提出的“大谈判”(Grand Bargain)的思路值得我们借鉴。这一思路是,中美之间应该就最核心、最深层次的问题集体谈判,用一揽子相互承诺来确保双方在损失最小的情况下尽快走出危机。这可能涉及一系列利益交换:就美国而言,向中国担保美国国债市场价值不会大幅下降,美元不会破坏性贬值;停止所有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美国居民开始调整自己的消费行为;就中国而言,在美方提供可信担保的情况下,可以进一步购买美国国债;大力刺激居民消费,大力发展服务业,增强人民币汇率机制弹性,缓解内外经济结构失衡。

在国内外经济增长乏力、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的前提下,相互指责相互掣肘要比相互体谅相互合作容易得多。能否在合作协商的基础上从危机中恢复并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失衡问题,取决于两国政府的大勇气与大智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



漫画 刘道伟
欧盟议员灰色收入惊人

在欧盟议会近年来关于补贴、出差报销等方面的丑闻不断。近日欧洲议会内部的一份秘密审计报告说,欧洲议会的议员中存在非常普遍的腐败行为,他们通过冒领各种费用补贴、出差报销和助手的工资等,仅仅一个5年任期就可获得超过100万欧元的巨额灰色收入。

其实我们握有不少铁矿石谈判筹码

熊锦秋

金融危机后,包括石油等资源价格大幅下跌,铁矿石巨头却不甘心照样大幅下调铁矿石价格。2009年度铁矿石谈判已进入第二轮,但如果谈判时间拖得越久对我们越不利,因为库存铁矿石总有用完之时,铁矿石巨头就是拿捏住需求方等米下锅这根软肋,故而每次谈判都敢于狮子大开口,甚至在履行协议的中途还要提涨价要求,并威胁如果不接受新价就停止发货。

那我们该如何寻找铁矿石谈判筹码呢?笔者试提出几点想法:

一,利用成本倒推法与巨头们理论铁矿石合理价格。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基本处于盈亏平衡点或微幅盈利状态,就以目前钢铁价格为基准,扣除生产经营中的各种必需成本,来倒推铁矿石原材料的合理价格。需要强调的是,目前一些钢铁企业尤其是民营小型钢铁企业之所以能够微幅盈利恢复生产,是因为这些企业对污染治理的投入不足,而我们必须将这些隐性成本透明化并纳入必需成本。

发达国家为保护环境而征收的大气污染税、水污染税和固体废物税甚至碳税等环境税,这些税负是企业经营中应有成本,而我国这方面的税收政策还不完善,多年以前出台的《环境保护法》已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我们理应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强制钢铁企业加强污染治理,建立对当地居民和环境的补偿机制,钢铁企业所花这些代价其实是生产环节的必需成本。

二,加大国内铁矿开采力度。2008年中国铁矿石进口量达4.4356亿吨,如果铁矿石不进口,即使国内铁矿业开足马力甚至扩大生产,国内经济需求和钢铁业产能完全可以消耗这些铁矿石增量。为适应钢铁业回暖趋势,并增加我们在铁矿石谈判中的筹码,国内铁矿业理应以配合开足马力生产,而钢铁企业也本着互惠互利原则充分利用国内资源并予其相应利润。我们不搞贸易保护,但在同等条件下,我们有权首先使用国内资源,让扩大内需政策首先惠及国内更多产业,增加更多就业岗位。

国内铁矿业扩大生产虽然只能带来数以千万吨级甚至只有百万吨级的矿石增量,但不要嫌这个筹码小,它在关键时刻完全可能改变天平两边力量对比,或许会成为压垮骆驼头头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利用当前机遇大力压缩钢铁产能过剩落后的产能。我国钢铁业产能过剩导致铁矿石需求旺盛,促使国际铁矿石卖方市场形成,铁矿石价格扶摇直上,而由此导致的钢材价格上涨压力我们只能转嫁到房地产等下游产业,中国经济承受不堪重负。我们早已由钢铁净进口国变为钢铁净出口国,但只能在国际市场中占据中低档产品的市场份额。钢铁业简单做大并未

给我们带来多少利益,我们把污染留给自己,把价值奉献给别人,可欧美一些机构还对中国出口钢材及金属制品(紧固件)征收反倾销税。事实上,如果我国钢铁业的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只会平添巨量运输成本,也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

按照钢铁产业结构调整规划,我们今后应以控制总量、淘汰落后、联合重组、技术改造、优化布局为重点,推动钢铁业由大变强。随着落后产能的淘汰,环境污染问题能得到缓解,而铁矿石供需关系扭转也可能导致价格下滑使钢铁生产原材料成本降低;另外,通过做大高、精、优型的钢铁深加工产业,我们产业的附加值反而可以成十倍地增加,可以说全方位受益。

四,加快钢铁上下游产业走出去的步伐。趁着目前矿山等资源价格大幅下跌的机遇,在做好周密调查研究基础上,我们应该出手购买或参股国外矿山资源,逐渐降低对铁矿石巨头的依赖度。另外,我们在钢铁行业上具有某些优势,可以到一些发展中国家投资建设钢厂,生产中可就地取材,而就地销售也可节约运输成本。

就世界金融危机的病根——美国的住房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布投入2750亿美元的住房救济方案,希望惠及最多900万户美国家庭。该住房救济方案与产业刺激方案以及早先公布的金融稳定方案可谓三味猛药,分别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三大顽症——民生、产业以及金融。三大顽症虽相对独立但又互相勾连,若不同时下药恐怕整体难以改善。其中,作为生计焦点的住房问题是防止恶性循环的关键,因此一直以来奥巴马的住房救济方案备受关注。

住房救济方案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帮助若于民间住房贷款利率过高的家庭降低合同利率。为此,政府向变更合同的贷款机构提供每份合同1000美元的补偿。

《朝日新闻》2月20日社论
住房救济能否除掉美国危机病根?

其次,放宽政府系统房贷机构的住房贷款利率降低的限制,以降低房贷偿还相关房贷的难度。第三,对于由此增加的住房金融公司的负担,政府将此前计划向这些公司投入的公共资金2000亿美元倍增至4000亿美元。最后,重新讨论破产法以减少无法偿还贷款的住房被当作二手房再次出售,后者会进一步导致房价市场下落,若不同时下药恐怕整体难以改善。由此可见,该住房救济方案虽然药效尚待观察,但是大方向是正确的。

奥巴马三味猛药的医药费已臻天文数字,财政恶化的猜测可能给金融市场带来不安。为了避免这种不安,美国应当尽早服用这三味猛药,让药效尽早体现出来。(梁宝卫 编译)

《卫报》2月19日评论 世界银行也失败了

当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心降到历史最低点时,要求做出重大改革的呼声响彻寰宇,世界银行改革的问题也被聚光灯于舞台中心。第一个改变应是重新评估世界银行的真实程度。世界银行在发展一个更可信赖以及可复制的国际测量标准上是失败的。20年过去了,它至今未能针对通货膨胀可靠地更改自己的测量标准,结果是贫穷被远远低估了。

第二个改变应是采取一个多样的社会开发策略。这包括创造就业、新的税收系统、阶段性的国际计划、负责的领导、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其中,新的国际公司法,以及其他有效的国家税收,将是必要的组成部分。(贺艳燕 编译)

《纽约时报》2009年2月19日文章 经济援助:把钱都给了傻瓜!

奥巴马的住房计划将迫使那些理性购房者资助那些购买了支付不起的房屋的这些人,也将迫使那些诚实的借债者补贴那些不诚实的借债者。这种不公平激起了愤怒,有人公开宣称“政府是在推动不良行为!”“总统应当建立一个网站,让人们来投票,看看人们是否愿意补贴那些失败者的抵押借款。”

几年前,全球经济文化开始改变。联邦政府提供低息贷款,使那些买不起房子的人也能买房。这种疯狂向上摇摆的举动制造出压倒一切的下行趋势。

这些摆动是真正的道德风险。在上述经济中,个人的责任无足轻重。在此情况下,政府出手干预试图减轻这种摆动就不难理解了。悲哀的现实是,在此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出钱救助的恰恰是那些曾经摇摆最疯狂的部门——房地产、金融等。政府不得不救助那些白痴们。

《朝日新闻》2月20日社论 住房救济能否除掉美国危机病根?

其次,放宽政府系统房贷机构的住房贷款利率降低的限制,以降低房贷偿还相关房贷的难度。第三,对于由此增加的住房金融公司的负担,政府将此前计划向这些公司投入的公共资金2000亿美元倍增至4000亿美元。最后,重新讨论破产法以减少无法偿还贷款的住房被当作二手房再次出售,后者会进一步导致房价市场下落,若不同时下药恐怕整体难以改善。由此可见,该住房救济方案虽然药效尚待观察,但是大方向是正确的。

《卫报》2月19日评论 世界银行也失败了

当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心降到历史最低点时,要求做出重大改革的呼声响彻寰宇,世界银行改革的问题也被聚光灯于舞台中心。第一个改变应是重新评估世界银行的真实程度。世界银行在发展一个更可信赖以及可复制的国际测量标准上是失败的。20年过去了,它至今未能针对通货膨胀可靠地更改自己的测量标准,结果是贫穷被远远低估了。

第二个改变应是采取一个多样的社会开发策略。这包括创造就业、新的税收系统、阶段性的国际计划、负责的领导、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其中,新的国际公司法,以及其他有效的国家税收,将是必要的组成部分。(贺艳燕 编译)

Column
专栏

中国经济失衡是结构性的,因而要采取结构性的对策,任何普惠制的消费券都不适用。政府虽然近几年财政有盈余,但用钱的地方更多,城市基础设施不说,三农、中小企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缺的就是资金。发放普惠制的消费券,既不会拉动经济走出低谷,也不能将企业带出困境,更不会增加就业机会,倒不如去救助失业人群,去建社保体系。

普惠制消费券:根本是滥用财政资源

消费券对拉动经济有没有作用?当然是有的,杭州消费券可以证明。据统计,杭州消费券的拉动作用明显。现在媒体炒的是深圳该不该发消费券,有研究机构建议深圳发20亿消费券,惠及900万人,云云。

但消费券拉动经济的作用能持续多长时间?仍以杭州为例,理论上从1月24日至4月30日消费券过期为止,多少都会拉动点消费。然而体现在时间坐标上,消费券使用时间也就是一个点,它对应的消费拉动就相当于一个脉冲,经济学上就是把消费券的刺激作用作为一个脉冲来处理的。在此语境下,要获得持续的经济拉动,显然得有持续的财政投入,因此消费券的持续投入及投入范围就取决于可使用的财力。

在正常经济环境下,消费券一般无人提及,即使针对特困人员的救济也是这样。因为在经济学上可以证明,实物救济由于限制了被救济人的选择权利而会导致他们的福利损失,因此对于被救济人来说,现金救济当然优于实物救济。消费券较之实物救济增加了被救济人的选择权利,因此要优于实物救济,但因为同样的理由,它劣于现金救济。

在经济危机时刻,由于社会总需求萎缩,凯恩斯主义者主张刺激需求来相应生产供给,促进经济趋向均衡。此时原来用于救济的现金如果改用消费券发放,虽然因限制了被救济人的选择权利而减少其个人福利,但多少会增加社会总福利。因此在危机时刻向特困人群发放消费券总体上是有益的,可以实行消费券的社会救助。成都、杭州等地的消费券发放可以看成这个类型,即消费券是对救助对象的现金替代。

然而在经济危机环境下,需不需要对社会大众发放普惠制的消费券呢?这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政府的财力,如果财力雄厚也没什么不可,比如香港2007年有1100亿元盈余,政府计划把400亿元回馈市民,这400亿在经济危机时改发消费券当然没问题;

其二,这个社会是否已经发达得没有什么用钱的地方,比如发消费券的日本,其城乡基础设施都非常完备,社会保障体制也完备,要刺激经济就普及消费券吧。但就是发达如美国者也不会发普惠制的消费券,因为美国觉得它的基础设施,如机场、公路需要大修了,一些地方对中国新建的基础设施都落后了,需要投入资金,新能源也需要投入,所以美国刺激经济计划

的规模再大,也不会推出普惠制的消费券。中国虽然近几年财政有盈余,但用钱的地方更多,城市基础设施不说,三农、中小企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缺的就是资金。发放普惠制的消费券,倒不如去救助失业人群,去建社保体系。

第三,消费券的作用能否真正促进经济回到平衡轨道。前面已说了,消费券的作用就像脉冲,如果经济这个心脏能在消费券脉冲刺激下很快恢复正常的跳动,发消费券当然可以,然而这样的事情在现实中从来没有发生过。即使人们把消费券的全部花出去甚至再附带自己的消费支出,也不足以将危机周期的经济短时间恢复正常,何况实际是消费券的使用往往去替换人们正常的消费支出而增加储蓄呢?

具体到深圳消费券的讨论,如果真如某研究机构主张的“20亿消费券”、“惠及900万人”,这便是普惠制的消费券了。这样的消费券一旦发放,我相信其中70%的钱不过是替换了人们正常的消费支出,得了消费券的市民会花掉消费券,同时得准备的花费存入银行。这难道真会拉动经济走出低谷吗?会将深圳外向型的中小企业带出困境吗?会使街头失业的农民工找到工作吗?一样都不会!20亿资金中

■本报牵手 CCTV-2 共同关注《全球商界领袖展望 2009》

唯有设法提高就业率才是正道



理查德·莱文

凯恩斯给我们上的最重要一课就是,在这种大衰退的条件下,货币政策没有用,减税也不奏效,只有提高就业率才是正道。如果你真想摆脱危机的话,就必须让失业率恢复到正常水平。6%、5%、6.5%都属于正常。而美国劳工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月,又有近60万美国人被解雇,使美国失业率达到了7.6%,创下自1974年12月以来34年的新低。所以,关键不是技术变革,而是就业,我的建议是,整个8500亿美元都应该花在创造就业机会上。坦率地讲,甚至应该投入1万亿美元。

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即使是耶鲁大学也不能幸免。2007年,耶鲁获得的捐助高达230亿美元,可是,2008年,这个数字骤降四分之一,仅有170亿美元。这个损失是很大的,你可以计算一下,捐助损失了25%,而学校45%的运营费用来自这笔资

金,这意味着10%到11%的运营费用消失了(哈佛大学的情况更糟:2008财年,哈佛获得的捐助基金比前一年减少了30%)。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比如在校内削减开支。我们目前不会削减教师的开销,但是学校还有1000多其他雇员,我们将把这些职位削减5%。未来两年,在非人事开销方面,如校外购置的材料和供应品,以及交通、娱乐方面会削减10%。

削减开支只是被动的节流,要维持这样一所大学的健康运转,开源更为重要。MBA的申请在增长,这是反通胀的变化,人们在华尔街失业了就倾向于回到商学院学习。但是,我们和其他一些学校不同,我们不会因为申请人数增加而改变录取条件。我们每年录取200名MBA学生,这不会因为申请人数的增加而有所改变。

《华尔街日报》2月20日专栏文章 绿色就业机会不太可能实现

奥巴马总统在丹佛签署《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法案》时宣称,这一将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加大投资的法律,“为美国的绿色能源经济奠定了基础,能够创造不计其数的报酬丰厚的就业机会。”

如果这种关于绿色工作的断言听起来太好而不可能实现的话,那是因为它的确如此。

因为可再生能源技术存在着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从经济角度看,它们是大赢家。可再生能源实在无法担当重任,即以具有吸引力的价格来为我们的经济提供必需的大量有用的、可靠的能源,这也正是为什么政府要资助它们的原因。

处于奥巴马计划之核心的这些替代能源技术,依靠行政命令和巨大的政府资助才得以进行,因此将不可避免地提高能源价格,而高动力价格则是就业杀手。制造

物质产品的工业,不管是汽车业、化工业还是纸业,都是能源密集型的,都是被具有低能源价格的地方吸引过去的。

《纽约时报》2009年2月19日文章 经济援助:把钱都给了傻瓜!

奥巴马的住房计划将迫使那些理性购房者资助那些购买了支付不起的房屋的这些人,也将迫使那些诚实的借债者补贴那些不诚实的借债者。这种不公平激起了愤怒,有人公开宣称“政府是在推动不良行为!”“总统应当建立一个网站,让人们来投票,看看人们是否愿意补贴那些失败者的抵押借款。”

几年前,全球经济文化开始改变。联邦政府提供低息贷款,使那些买不起房子的人也能买房。这种疯狂向上摇摆的举动制造出压倒一切的下行趋势。

这些摆动是真正的道德风险。在上述经济中,个人的责任无足轻重。在此情况下,政府出手干预试图减轻这种摆动就不难理解了。悲哀的现实是,在此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出钱救助的恰恰是那些曾经摇摆最疯狂的部门——房地产、金融等。政府不得不救助那些白痴们。

《朝日新闻》2月20日社论 住房救济能否除掉美国危机病根?

其次,放宽政府系统房贷机构的住房贷款利率降低的限制,以降低房贷偿还相关房贷的难度。第三,对于由此增加的住房金融公司的负担,政府将此前计划向这些公司投入的公共资金2000亿美元倍增至4000亿美元。最后,重新讨论破产法以减少无法偿还贷款的住房被当作二手房再次出售,后者会进一步导致房价市场下落,若不同时下药恐怕整体难以改善。由此可见,该住房救济方案虽然药效尚待观察,但是大方向是正确的。

《卫报》2月19日评论 世界银行也失败了

当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心降到历史最低点时,要求做出重大改革的呼声响彻寰宇,世界银行改革的问题也被聚光灯于舞台中心。第一个改变应是重新评估世界银行的真实程度。世界银行在发展一个更可信赖以及可复制的国际测量标准上是失败的。20年过去了,它至今未能针对通货膨胀可靠地更改自己的测量标准,结果是贫穷被远远低估了。

第二个改变应是采取一个多样的社会开发策略。这包括创造就业、新的税收系统、阶段性的国际计划、负责的领导、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其中,新的国际公司法,以及其他有效的国家税收,将是必要的组成部分。(贺艳燕 编译)